

【日】古瀬奈津子 著

郑威 译

遣唐使眼里的中国

总主编 冯天瑜 【日】刘建辉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通过对唐代中国与古代日本之仪式、典礼的比较，

发掘古代中国社会与古代日本社会的差别，

从而进一步明确日本社会及文化自身的特质。

更可以从遣唐使来探究唐帝国的

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内蕴及演变。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古瀬奈津子」著

郑威 译

总主编 冯天瑜 [日] 刘建辉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遣唐使眼里的中国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遣唐使眼里的中国/(日)古濑奈津子著;郑威译.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0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ISBN 978-7-307-05888-0

I. 遣… II. ①古… ②郑… III. 中国—传统文化—
影响—日本—研究—唐代 IV. K242.03 K3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163 号

KENTOUSHI NO MITA CHUUGOKU
Copyright ©2003 by Natsuko FURUSE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Yoshikawa Kobunk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shikawa Kobunkan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o., Ltd.
此书经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由吉川弘文馆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7—2006—046 号

责任编辑:詹 蜜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5 字数:113 千字
版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5888-0/K · 349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20 世纪初叶，文化传播学派代表学者德国人格雷布内尔（F·Graebner 1877 ~ 1934 年）与奥地利人施密特（W·Schmidt 1868 ~ 1954 年）提出“文化圈理论”，认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每个文化圈包含一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有成分。此说庶几反映世界文化史实际，故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被普遍采用。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造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近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往往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中心文化丛”（或曰“文化核心区”、“文化源地”），以其首创的文化播扬于周边地区（或曰“文化边缘区”、“文化受容地”），在核心与边缘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当然，这种中心——边缘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有所异动的。时下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希腊——罗马文化、从希伯来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曾是具有丰厚积淀与强大扩散力的文化源地，以其为核心形成各自的文化圈。另外还有一种更具全球视野的划分：东地中海文化圈（以后扩展为北大西洋文化圈，俗称西方文化圈）、西亚北非闪族文化圈（今伊斯兰文化圈）、

南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中南美印地安文化圈。

文化圈可从地理、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等多种角度划分与命名。上述“东亚文化圈”以地理属性得名，其范围约指东亚大陆及周边半岛和岛屿，大略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从体质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居民同属蒙古人种；从文化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共同拥有汉字汉文（故有“汉字文化圈”之称）、儒学（故有“儒学文化圈”之称）、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等等。

拥有若干文化共相的“东亚文化圈”，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国是东亚最先进、强大的国家，占据文化高势位，是文化输出国，中国的水稻、粟、麦栽培技术，冶金、养蚕、缫丝技术等传入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之相随，前述汉字文化的诸多门类也播扬周边列国。诚如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诗称：

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幸武功庆善宫》）

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正日临朝》）

越、朝、日等东亚文化圈周边诸国，皆有自己辉煌的文化创造，同时也都接受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以日本为例，曾一再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彰显了东亚文化圈边缘带研习核心区文化的热情与执著。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强调，日本是中国文明圈的一员，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

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卤水。（《日本文化史研究》）

时至近代，东亚诸国都面对工业化西方的来袭，西学东渐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新命题，东亚诸国在 19 世纪中末叶先后进入社会及文化近代转型过程。比较而言，日本较迅速地吸纳西方近代文明，实现近代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先进国和新的文化源地，中日文化势位对比发生异动，文化传输的主流方向逆转：古代是中国——日本，近代是日本——中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出现留日热潮，便是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努力。进入现当代，中、韩等国现代化取得长足进展，渐成迎头赶上之势，在新的文明水平上，东亚诸国发生着空前深刻的文化互动，东亚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耀，对全球文明的影响力也日益巨大，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当下世界最为强劲的两大大文化圈，当然，其他文化圈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

概言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亚文化圈诸国互为师友，由于文化互动而彼此受益。在近代，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与东亚文化圈其他诸国严重对抗，造成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劫难。郭沫若先生曾把中日两国关系概括为“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反顾东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历程，我们有充分理由宣称：和则互利，斗则两伤。化干戈为玉帛是时人的使命，也正是本书系的基旨所在。

笔者近十余年来多次参加以东亚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事相关合作研究，结识东亚列国学者，并研习其论著，亲炙东亚文化丰富的内涵，渐以推介东亚文化为乐事。2004 年夏至 2005 年夏，笔者访学于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邀约笔者选取一批反映东亚文化的日文书籍，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受命后笔者即与“日文研”刘建辉博士从近二十年出版的相关论著中择得八种，延请译

者，经两年劳作，成此“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本书系着眼东亚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曲折多致历程，所选择的论著，或总论整个东亚文化圈诸国间的文化互动（如池田温的《东亚文化交流史》、福井文雅的《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或用力于东亚文化圈某一国度的文化史（如铃木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森贞彦的《〈菊与刀〉新探》、上垣外宪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或研讨东亚文化圈内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史（如古濑奈津子的《遣唐使眼里的中国》、阿部洋的《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刘岸伟的《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就浩博的东亚文化而言，这些论著所述当然只是冰山一角，却也可以一斑窥豹、以蠡测海。

2007年10月24日拟于武昌珞珈山

目 录

序言 遣唐使研究的新视角	1
第一章 从日本出发	10
一 遣唐使的任命与准备	10
二 自难波港出发	15
第二章 在扬州	17
一 抵达中国的遣唐使与扬州城	17
二 中国的国忌行香与日本的国忌	24
三 乞雨仪礼	33
四 唐朝的诏书与仪礼	41
五 日本的诏敕及其传达	50
第三章 在都城长安	58
一 长安与大明宫	58
二 与皇帝相见	70
三 皇帝的赐宴	83
四 日本的外交仪礼	97
五 朝贺仪式	102
六 朝贺后的宴会	121

第四章 日本的仪式与唐的影响·····	129
一 日本的仪式与吉备真备·····	129
二 遣唐使与唐之仪礼·····	135
三 日本仪式的唐化·····	139
结语 遣唐使带回了什么·····	142
参考文献·····	145
后记·····	148

序 言

遣唐使研究的新视角

遣唐使与外交礼仪

要了解日本历史，仅仅关注日本国内是远远不够的，十分有必要将日本史置于日本与亚洲、与世界的关系中进行考量。尤其是在古代日本的研究中，必须具有这样的视角，即在东亚政治、文化交流过程中研究日本古代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而在古代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中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则非遣唐使莫属。

关于遣唐使，虽然许多著作与论文均有论及，但如今人们对他们的印象似有失偏颇。提到他们，为人所熟知的是，高中教科书中记载首次接受派遣的是犬上御田锹；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因数次海难归国未成，终生仕于唐帝；对后来日本佛教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鉴真东渡等等。此外，通过遣唐使，丝绸之路的文化、文物得以传入我国，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收藏的众多丝绸之路的文物是其中较著名的物证。

换言之，可以说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遣唐使作为文化使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较深。然而，近年研究中已渐明朗的是，由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在唐朝始终都被认为是朝贡使。遣唐使一直都起着日本向唐朝皇帝进贡，并与唐缔结外交关系这一政治作

用。而唐之法典、制度、文化以及文物的输入则是次要的。因此，遣唐使在唐所进行的最为重要的活动，可以说就是举行外交礼仪以及与唐确认关系的诸多仪式。

现代外交有各种层级，我们有这样的印象，一般认为首脑会谈与宫中晚宴（国宴）等仅是礼仪与形式上的内容，实质性的外交是通过专门官员们的会谈来实现的。但在古代，外交礼仪本身就是真正的外交实体，有重要的实质内容。

本书拟从这一视角出发，观察遣唐使在唐实际上参加或观摩了何种仪式、典礼，并考察其在政治上、文化上所起到的作用。另外，又因为古代日本以唐制为模本，构筑了自身的以律令为首要代表的各种制度与文化，所以本书还将涉及一些日本的仪式与典礼，它们可以与遣唐使们在唐所参加、所观摩的仪式、典礼相对应，通过对二者的比较来分析古代日本社会是怎样接受中国文化的。通过对唐与日本仪式、典礼的比较，我们认为可以更明晰唐朝皇帝与日本天皇的差别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与日本古代社会的差别，并可以更进一步明确日本社会及日本文化所具有的特征。

前期的遣唐使

这一部分先就遣唐使略作概述。关于派遣遣唐使的次数说法虽有不同，但一般认为共有二十次，以平均十六年一次的频率派出。这一频率与新罗、渤海等东亚其他国家相比非常之低。新罗、渤海等国国王由唐朝直接策命，是与唐有册封关系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相比，日本与唐虽被认为是朝贡关系，但从外交层面来讲这种关系则略显不足。

遣唐使一览表①

次 (间隔)	任命·出发 年次	使节名	人数· 船数	归国时间	备考
1 (21 年)	630 (舒明二) 年 出发(下省略 “年”字——译者)	犬上御田锹 药师惠日 (大使)吉上 长丹 (副使)吉士 驹	121 人 2 艘	632 (舒明 四) 645 (白雉 五)	唐使高表仁 一同归国, 留学生、留 学僧 21 人 同行
2 (0)	653 (白雉四) 出发	(大使)高天 根麻吕 (副使)埴守 小麻吕	120 人 2 艘	中途遇难	高田根麻吕 之船于萨摩 竹岛附近遇 难
3 (4)	654 (白雉五) 出发	(押使)高向 玄理 (大使)河边 麻吕 (副使)药师 惠日	2 艘	655 (齐名 元)	
4 (4)	659 (齐名五) 出发	(大使)坂合 部石布 (副使)津守 吉祥	2 艘	第二艘船 661 (齐名 七)	第一艘船在 途中飘往南 海
5 (0)	665 (天智四) 出发	守大石 坂合部石积		667 (天智 六)	将唐使刘德 高送至驻守 于旧百济领 的唐军中 (不确定)

① 石井正敏：《外交关系》，载所著《唐与日本》，吉川弘文馆，1992年，第74~76页。

续表

次 (间隔)	任命·出发 年次	使节名	人数· 船数	归国时间	备考
6 (1)	667(天智六) 出发	伊吉博德 笠诸石		668(天智 七)	将唐使司马 法聪送至驻 守于旧百济 领的唐军中
7 (31)	669(天智八) 出发	河内鲸		670(天智 九)?	庆贺平定高 句丽
8 (12)	701(大宝元) 任命 702(大宝二) 出发	(执节使)粟 田真人 (大使)(高 桥笠间) (大使)坂合 部大分 (副使)巨势 邑治 (押使)多治 比县守		704(庆云 元)	副使 707 年 回国,大使 与第九次遣 唐使一同归 国
9 (14)	716(灵龟二) 任命 717(养老元) 出发	(大使)(阿 倍仲麻吕) (大使)大伴 山守 (副使)藤原 马养	557 人 四艘	718(养老 二)	留学生阿倍 仲麻吕、吉 备真备、僧 玄昉等随行
10 (12)	732(天平四) 任命 733(太平五) 出发	(大使)多治 比广成 (副使)中臣 名代	594 人 四艘	第一艘船 734(太平 六)	第二艘船 736 年回国。 第三艘船漂 至昆仑。判 官平群广成 等经渤海 国,于 739 年回国。第 四艘船下落 不明

续表

次 (间隔)	任命·出发 年次	使节名	人数· 船数	归国时间	备考
11 (4)	746(天平十 八)任中止	(大使)石上 乙麻吕			
12 (6)	750(天平胜宝 二)任命 752(太平胜宝 四)出发	(大使)藤原 清河 (副使)大伴 古麻吕 (副使)吉备 真备	第二、 三艘共 计230 余人 四艘	第二艘船 753(太平 胜宝五)	归途,大使 与阿倍仲麻 吕等所乘第 一艘船漂至 安南,后二 人未回国, 在唐为官
13 (0)	759(天平宝字 三)任命,同年 出发	(大使)高元 度	99人 一艘	761(太平 宝字五)	为迎回藤原 清河,随归 国渤海使同 行,经渤海 国人唐。唐 使沈惟岳等 相送
14 (1)	761(太平宝字 五)任命,后中 止	(大使)仲石 伴 (副使)石上 宅嗣 (副使)藤原 田麻吕			因船只破损 而中止行程
15 (13)	762(太平宝字 六)任命,后中 止	(大使)中臣 麿主 (副使)藤原 田麻吕	因风 向不 顺而 中止		

续表

次 (间隔)	任命・出发 年次	使节名	人数・ 船数	归国时间	备考
16 (0)	775(宝龟六) 任命 777(宝龟八) 出发	(大使)佐伯 今毛人 (副使)大伴 益立 (副使)藤原 鹰取 (副使)小野 石根 (副使)大神 末足	四艘	778(宝龟 九)	归途中四艘 船皆遇难, 小野石根、 唐大使赵宝 英等溺
17 (20)	778(宝龟九) 任命 779(宝龟十) 出发	(大使)布势 清直	二艘	781(天应 元)	送唐使孙兴 应等人回至 明州
18 (29)	801(延历二 十)任命 804(延历二十 三)出发	(大使)藤原 葛野麻吕 (副使)石川 道益	四艘	805(延历 二十四)	第三艘船行 至肥前松浦 郡庇良岛附 近海域遇 难。第四艘 船下落不 明。空海、 最澄等随行
19 (55)	834(承和元) 任命 838(承和五) 出发	(大使)藤原 常嗣 (副使)小野 篁	651人 四艘	第一、四艘 船839(承 和六)	第三艘船自 筑紫出航后 遇难,船上 140人皆未 入唐;僧圆 仁、圆载等 随行;第一、 四艘船人员 雇新罗船, 分乘回国; 第二艘船于 840年回国

续表

次 (间隔)	任命·出发 年次	使节名	人数· 船数	归国时间	備考
20	894(宽平六) 任命,未实施	(大使)菅原 道真 (副使)纪长 谷雄			

虽然从唐朝的视角来看,遣唐使终究只是朝贡使,但其性质随时代不同而又有变化。从大的方面看,遣唐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后两期的遣唐使,其目的、组织、航路均大有不同。前期指从第一次至第七次。这一时期为朝鲜半岛的动乱期,与唐联合的新罗和与日本联合的百济争夺霸权。在这种相互对立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的遣唐使更具政治调和者的性质。但是,天智六年(663年)白村江之战中,唐、新罗联合军进攻百济,日本向朝鲜半岛发兵救援百济,却以惨败告终。这导致日本从朝鲜半岛撤军,其后遣唐使的派遣也暂时中断。

一般认为前期遣唐使的平均规模是两艘船,一百二十人。去唐的航路一般经由北路,即先从北九州的博多启程,经壹岐、对马,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横渡黄海,在山东半岛登陆,然后由陆路向都城长安进发。由于北路沿朝鲜半岛前行,安全性较高,但耗时日久,而且沿途不能缺少百济与新罗的帮助。

后期的遣唐使

后期的遣唐使,始于第八次,终于第二十次。从前期的最后一次即第七次到后期的最第一次即第八次,之间的间隔长达

三十一年。遣唐使派遣间隔如此之久的原因，一般认为一方面是白村江之战战败后的后续症状；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于天武元年（672年）爆发“壬申之乱”，其后天武天皇以降诸天皇均倾全力于国内政治，重建朝廷统治基础，并力求建立律令国家，根本无暇顾及遣唐使的派遣。

大宝元年（701年）大宝律令的编纂，标志着日本作为律令国家迈出了第一步，以此为契机，遣唐使的派遣也得以重新开始。朝鲜半岛的动乱等也渐平息，以唐为核心的东亚世界进入了较为安定的时期。日本遣唐使虽仍有向唐帝进献贡品，确认自身在以唐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的位置的目的，但前期的政治调和这一较为急切的目的渐渐消失，转而偏重于输入法典、文化以及文物这些偏侧面的内容。



图1 遣唐使航路图